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文学翻译与 译介学理论新探

A New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Medio-Translatology

夏廷德 刘迎春 陈文铁 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理论新探

A New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Medio-Translatology

夏廷德 刘迎春 陈文铁 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 夏廷德, 刘迎春, 陈文铁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理论新探 / 夏廷德, 刘迎春, 陈文铁著. —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632-2382-4

I. ①文… II. ①夏… ②刘… ③陈… III. ①文学—翻译理
论—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4620号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 大连市凌海路1号 邮编: 116026 电话: 0411-84728394 传真: 0411-84727996

<http://www.dmupress.com> E-mail: cbs@dmupress.com

大连华伟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发行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幅面尺寸: 140 mm×203 mm

印张: 8.25

字数: 218千

印数: 1~500册

责任编辑: 姜建军

版式设计: 晓江

封面设计: 王艳

责任校对: 沈荣欣

ISBN 978-7-5632-2382-4

定价: 17.00元

献给中国高等航海教育暨
大连海事大学建校 100 周年

本书由

大连海事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Academic Works Publishing Foundation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序

汪榕培

以文学翻译而论，21世纪是中国文学翻译的黄金时期，既是文学翻译实践的黄金时期，又是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黄金时期。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各种形式的翻译活动空前活跃。从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视野的开拓和学科的交叉使各种翻译理论流派层出不穷。每个理论流派都在不断发展之中，而且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图里（Gideon Toury）在1995年出版了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一书，皮姆（Anthony Pym）则在2008年就出版了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对其加以发展。值得深思的是，在新书的前言中皮姆引用了图里在2005年说的一段话：

“I started being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methodology, not in theory.

I was never interested in theory *per se*. My question was always:

How are we going to justify the way we do research?”

以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而论，文学是翻译的一个范围，文学翻译当然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方面；翻译的文学作品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类型。翻译文学当然是作为多元系统的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也是发端于比较文学的译介学的一个方面。文学和翻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

文学和翻译各自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紧密关系，使多种学科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或者翻译文学也就在所当然了。这些视角既有交叉重叠的地方，又有可以取长补短的地方，出现相互冲突的地方是不足为奇的，把不同的视角整合起来形成新的视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夏廷德、刘迎春和陈文铁的著作《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理论新探》（以下简称《新探》）就是试图在整合中寻求新视角的一次努力。

《新探》在回顾文学翻译理论和译介学各自的发展历史和学科特点以后，设法把隶属于翻译学的文学翻译分支和隶属于比较文学的译介学分支融合起来，从而把译介学当做文学翻译理论的一个新视野，这无疑是一本书最大的贡献。

根据谢天振先生的论述：

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术语，最初是中国学者针对进入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及其相关研究而提出来的，直到现在还没有相应的固定英语术语。而从比较文学立场出发的翻译研究，也即我们这里所说的译介学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因为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把翻译文本作为既成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把翻译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而不是外语教学研究的对象加以审视和考察。

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也即译介学研究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对翻译实践操作的规定、指导，从而更富美学成分。

（谢天振，2007：6）

《新探》的作者对于译介学的上述定义进行了下列归纳：第一，译介学是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密切相关；第二，译介学是有关文学或文化的研究；第三，译介学不把翻译中语言现象作为重点，因而翻译的对错不是评价的标准；第四，译介学不会对教学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最后，译介学具有审美的目标。

由于翻译的对错不是评价的标准，所以，讹谬性变易（无意与误译）和创造性变易（有意与善译）几乎就处于等同的位置了，反正都是“创造性叛逆”。由于译介学不会对教学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所以，译介学对翻译学研究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被自身的定义否定掉了。谢天振先生是我的校友，我对他的研究非常佩服，因为他是个做学问的人。我在一次博士论文答辩后与他闲谈时，也当面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的研究不是给他们看的。

《新探》的作者就解决了也给“他们”看的问题。这里的“他们”就是《新探》的读者对象——翻译方向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翻译研究者。例如，译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揭示它与文学创作的相通之处，所以就会有“创造性叛逆”（包括“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和“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的说法。“创造性叛逆”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翻译文学作品当然不能处处逐字翻译，从传神到达意都有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起作用。译者主体性问题值得我们研究，而到目前为止研究得还不够，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即使是误译，乃至扭曲和篡改，也应该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就像在语言学中为了研究人为什么有语言能力的一种方法是研究失语症一样。误译看似杂乱无序，发生的频率却并不低，尤其在当前浮躁的学风下，粗制滥造的作品屡见不鲜。误译既有语

言内的原因又有语言外的原因，既有译者的主观原因又有外在的客观原因，非常值得研究，但是现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果有谁能写一本《误译学》，找出误译产生的原因和规律，包括从哲学、民族、心理、文化等角度来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他对翻译学的贡献则不可小视。

上面只不过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学翻译学与译介学相结合是大有好处的，文学翻译学有了新视角，译介学在文学翻译学中也有了用武之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探》的确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对《新探》的作者是比较熟悉的，夏廷德是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刘迎春跟我读了三年博士。他们都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博士和教授，他们不为金钱地位所惑，对学术执著追求，热爱英语教学，勤奋科学研究，《新探》就是他们合作而成的一个结晶。

我这几年翻译实践做得比较多，尤其是昆曲翻译（也算是文学翻译吧），也为我的家乡苏州作点贡献，所以理论文章比以前写得少多了，但是这次很高兴为他们的新作写上几句感想，并借此机会祝他们作出更多的成绩。

2009年7月17日于大连

前 言

文学翻译隶属于翻译学，而译介学隶属于比较文学，两个不同学科的分支何以交汇于一个名目之下。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传统文学翻译研究中二元对立的狭隘观念与在当代文学翻译研究中多元并存的开阔思路谈起。

文学翻译历史悠久。除宗教圣典翻译之外，极目中外之浩瀚译事，其影响大者莫过于文学，其研究众者莫多于文学。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人安德罗尼柯就已将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译成拉丁语，标志着西方文学翻译史的发轫，之后文学翻译与《圣经》翻译两股支流汇成西方翻译史上第一次大潮。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人西塞罗就开始对文学翻译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先后涌现出贺拉斯、昆体良等一批活跃于译坛的翻译理论家。虽历经两千载，人们对文学翻译研究的热情却始终不减。

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波大潮当属佛经翻译。与西方相比，这股大潮中缺少文学这一股支流，因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广、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度之一，故文化以输出为主，文化输入则不足以为人称道。

然而作为意识形态引进的佛经实际上也不乏文学诸元素。鲁迅曾言：“常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文艺往往蒙其影

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1]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中罗摩的故事也已通过佛经简略译介过来。另外,佛经原文中还有小说体、半小说体、半戏剧体作品^[2]。佛经原文如此,佛经汉译也未放弃对美和艺术的追求,甚至连佛经译论也未将文学艺术因素排除在外。虽然佛经译场主持人高僧道安为顺应众心,在忠实前提下违心同意将质朴的经文饰以文采,但鸠摩罗什却是公然倡导辞藻讲究、音律优美的译笔。可见中国译界对文学翻译研究的执著亦有千载之余。

大抵正是人类对文学或文学元素普遍情有独钟,才使得文学翻译成为最受瞩目的翻译研究领域之一。然而纵观中外翻译史,亘古通今,文学翻译的探索对语义传达、风格再现和修辞讲究偏爱有加,而对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和其他非语言因素则关心不足,这实在是译界一大憾事。比如,西方译论常见的二元对立概念有“word for word”(逐词)与“sense for sense”(达意)的对立、“faithful”(忠实)与“free”(自由)的对立、“literal translation”(直译)与“free translation”(意译)的对立、“formal equivalence”(形式等值)与“dynamic equivalence”(动态等值)的对立等等。在中国有“质直”与“文饰”的对立、“文”与“理”的对立、“直译”与“意译”的对立、“信”与“顺”的对立、“形似”与“神似”的对立等等。

[1]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增订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第90~91页。

[2] 同上,第93页。

诚然，语言作为信息载体其功用如何强调亦不为过，但语言并不能尽翻译全部之职能。语言不过是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之一，语言之外，制约翻译者的尚有异质文化、异类诗学、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传统翻译研究对上述因素往往视而不见，幻想凭借语言转换达到译文忠实、达意、等值、神似等目标；然而译坛的冷酷现实始终难圆翻译理论幻想家这一美梦，因此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

当今译界学者一改传统思维定式，冲破狭隘的二元对立的藩篱，开始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诗学等多个视角对文学翻译进行观察与论证。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新方向；埃文—佐哈尔创造性地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的概念；韦努蒂透过主导英美译界的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策略解读出“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种族主义”(racism)和“霸权”(hegemonic)的本质，揭示了政治经济地位对翻译策略的影响。阿尔瓦雷斯和比达尔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明确提出翻译是政治行为的命题。这些译界勇士的破冰之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虽然上述种种观点处于不同的视角，但都指向一个共识，即影响翻译结果和效果的远不止语言一个因素，无论原文还是译文，无一例外要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影响和政治、经济、宗教、民族、阶层、心理等因素的制约。

这场滥觞于西方译界的翻译新思维的大潮不仅涤荡着西方译界的陈旧观念，也在中国掀起波澜。1999年，谢天振先生在国内

首次推出《译介学》一书，打破了译坛多年的沉寂，在国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方面引领了潮流。这部专著一反常态，别开生面，给沉网的译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令许多当时尚不知何为译介学的译界学者、译者，乃至爱好者驻足争阅。书中引入的“创造性叛逆”的命题、对“误译”价值的首肯等观念，从宏观上为变易或变异翻译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对于翻译在转换过程中文化信息的失落、变形、扩伸、增生等方面的探索，则从微观上为创造性翻译走向实践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工具。由此可见，译介学有关创造性叛逆的研究、有关对“误译”价值的肯定、有关对翻译失落与变易的探索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研究是将其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展开的，并将这一比较文学项下的翻译研究定位为“一种文学或者文化研究”，把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并且不做价值判断，而且明示它缺乏对外语教学和具体翻译实践的直接指导意义^[1]。显然，这样一项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果仅停留在比较文学的领地，而不能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堂而皇之地发挥作用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因此，笔者在几年间苦苦期盼有朝一日译介学终能与文学翻译走到一起。2006年冬，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下达，在所列的项目中，笔者恰逢“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理论研究”一项，真是令人喜出望外。经过一番争取，如愿拿到了这个项目。之后项目组就开始了长达近两年半的课题研究工

[1]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页，第9页。

作和本书的撰写。

本课题融合了隶属翻译学的文学翻译分支和隶属比较文学的译介学分支。其目的在于使译介学走出比较文学的单一领地，跨入文学翻译研究的门槛，使之成为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范畴，而不是文学翻译的副产品，并将译介学从比较文学的母体继承的跨越性优势移植过来，给文学翻译研究注入新的动力，使之走出传统的、过分偏重语言的模式。因为传统文学翻译研究缺少与其他学科的积极的对话与互动，并因此形成了以语言本位为主的价值判断体系。译品优劣多以原文语言为标准，而对翻译中的增补、删减、修改等操作往往给予负面评价，动辄将其指责为不忠的翻译，忽略了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障碍、诗学传统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冲突等诸多因素。事实上，正是这些因素常促使译者作出偏离原文的抉择。实际上这些抉择不乏积极因素，它们对文学作品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避免意识形态的冲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与缓冲作用。

虽然这项研究给文学翻译增加了文化、诗学和意识形态等非语言因素的砝码，但并非重走译介学原有的老路，文学翻译项下的译介学研究因为要服务于翻译，自然要关注与翻译密切相关的语言要素、价值判断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为它毕竟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纯粹的文学研究。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为翻译方向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翻译研究者。由于书中有的章节提供了大量的翻译案例作为支撑，相信偏爱实践的翻译爱好者也会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找到适

合自己兴趣的篇章。

本书由夏廷德、刘迎春和陈文铁执笔。全书总体框架的构思、设计和统稿由夏廷德负责。本书各章的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二章由陈文铁撰写；第三章、第四章由夏廷德撰写；第五章、第六章由刘迎春撰写。

此项研究是将译介学纳入翻译学范畴的文学翻译领域进行的系统性研究，以其性质和规模而论，在国内尚属首次。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恳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夏廷德

2009年3月于大连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与译介学的发轫和发展	1
第一节 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概念与概况	3
第二节 译介学的界定：介绍与介入	18
第三节 译介学与比较文学：失落与勃兴	24
第四节 译介学与文学翻译：陌路与莫逆	32
第二章 翻译学、文学翻译研究与译介学的关系	37
第一节 翻译学：二元一统与多元统一	37
第二节 文学翻译研究：后现代视角与文化转向	44
第三节 译介学的加盟：动力与推力	53
第四节 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的合力效应：回馈与循环	62
第三章 语言与非语言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及其表现形式	70
第一节 语言的影响：异形与异质	72
第二节 诗学的影响：模拟与虚拟	93
第三节 文化的影响：儒释道与西方文化	112
第四节 意识形态的影响：霸主与民主	126

第四章 文学翻译的变易及其意义	137
第一节 论谬性变易：无意与误译	137
第二节 创造性变易：有意与善译	150
第三节 翻译变易的功用与评估：借鉴与诊断	168
第四节 翻译大潮与大势：求同与存异	171
第五章 译介学的历史功绩与潜能	173
第一节 译介学对比较文学的贡献：认识与互识	173
第二节 译介学对文学翻译的贡献：靠近与促进	180
第三节 译介学的文学翻译转向：回归与回升	195
第四节 文学翻译理论的新视野：译介学范畴与范式	200
第六章 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的新型关系	209
第一节 从独往独来到携手共进：并行与并轨	209
第二节 发挥各自优势弥补自身瑕疵：平等与互惠	217
第三节 跳出传统藩篱融入时代潮流：开放与开辟	223
第四节 文学翻译与译介学的明天：离心与向心	229
参考文献	235
后 记	244

第一章 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与译介学的发轫 和发展

翻译,一般来说,是不同语言之间互相交流和传达信息的活动。信息可以是多种多样,如语义的、文体的以及文化的等。方式可以不局限在书面的、肢体和手势的以及图画的,还可以包括机器的(如机器翻译),甚至可以在人机之间进行。方梦之认为翻译这个词至少包含五层含义:翻译过程,翻译行为,翻译者,译文或译语,翻译工作。他从这五层含义中总结出翻译的三层意思:(1)翻译的目的在于满足不同社会认知需要;(2)翻译的媒介物存在于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3)翻译的性质是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活动(方梦之,2004:9)。

概而言之,翻译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活动,跨越了不同民族和不同语种的界限,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形式,从而达成交流的默契和建立起沟通的方式。人类在自然的繁衍中,逐渐形成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产生不同的语言。但人类不是独居行事的,往往需要相互交往,进而表达彼此思想和情感,于是,沟通成为必要的手段,这就形成了翻译的雏形。

中西方的翻译都有悠久的传统。在西方,从古罗马帝国到欧洲联盟,从各民族的交往,到各国文化、政治、经济的交流,翻译都起到较大的作用。早在公元前3至2世纪,72名犹太学者开始了《七十子希腊文本》的翻译。此后,西方翻译史出现了6次翻译的高潮,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中国历史看,周朝就有了翻译,如《后汉书·南蛮传》中记载的有个叫做“越裳国”的城邦,当时君主在其执政期间,不仅制礼作乐,使得天下和平,而且组织“三象”翻译其他城邦的文字,这里的“象”,就是翻译官,后专门指翻译南方语言的官员。而中国大规模的